

理想
藏书

典藏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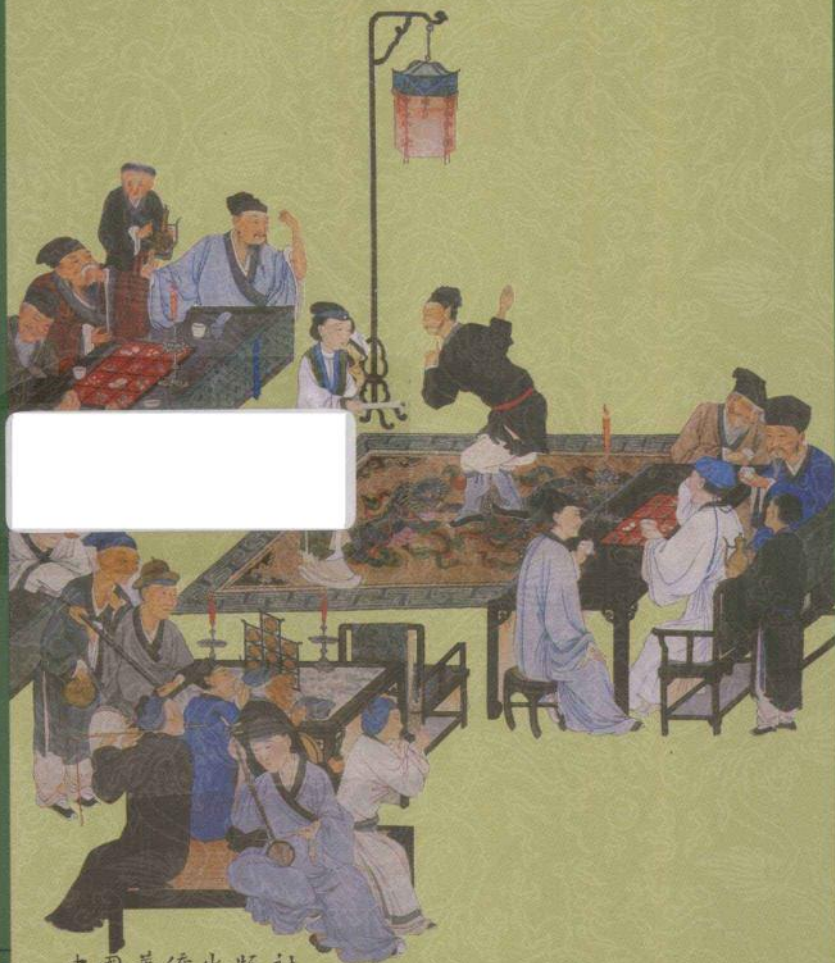
□桑楚 主编

中国人必读、必知的文化常识

下



知识性 趣味性 实用性 参考性
一本书轻松掌握中国文化精髓



中国华侨出版社

趣味文化常识

大全

趣味十足的文化常识百科全书
寓教于乐的传统文化知识宝库

开阔视野 提升品位
寓教于乐 增长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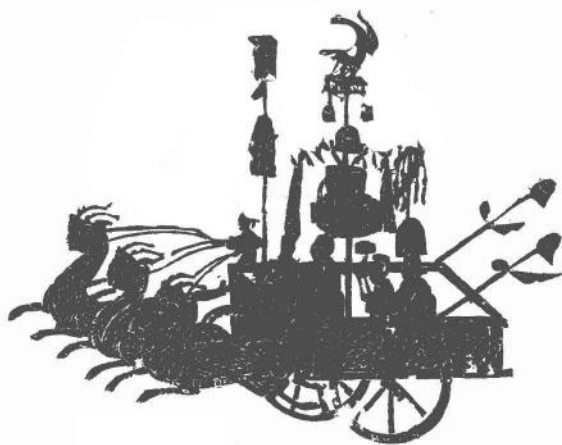
本书涵盖了人们应该懂得而又易于掌握的各门各类知识，包括国家政治、朝政机构、军事法制、天文历法、俗语谚语、文史典籍、书画乐舞等，将知识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和谐地融为一体，增强了可读性，让读者游弋在逸闻趣事点綴的知识星空中，体会阅读带来的无限乐趣。

一部囊括中国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

趣味文化常识

大全 (下)

桑楚◎主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第九章

图书文档·文史典籍



为什么把书叫“图书”？

生活中，人们经常将“书”称为“图书”。类似的，借阅书的地方似乎本应叫“书馆”，却被叫做“图书馆”；与书相关的行业不叫“书行业”，而叫做“图书行业”，似乎书是离不开图的。“图书”的说法既然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是不是古代的书都有图？

“书”被叫做“图书”的原因，现在已经不太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古以来，书与图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周易·上系辞》里，便记载了“河出图，洛出书”的上古神话故事。显然，先秦时期，“图”与“书”便被人们习惯性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书”这个字，在古代有“文字”的意思。而我们知道，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本是由图形演变而来。因此，在古人的思维习惯里，图与字，大概本是一种东西。由此看来，“图”与“书”连在一起也是很自然的了。

另外，从古代早期的书来看，也的确是文字与图画并重的。在古代，教育不发达，识字的人很少。图画是可以绕过文字直接传递信息的。因此，为向那些不识字的人讲述故事、宣传伦理道德等，大部分书籍都是图文并茂的，在文字旁边往往配有图画作直观展示。因此，中国自古有“左图右史”（史指文字）的说法。尤其是宗教性质的书籍，因为要面对大量不识字的下层民众，更需要借助于图画来宣扬教义。佛教的许多宣传性质的典籍，干脆没有文字，全部由图画构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时，也借用大量的图片来宣扬教义。直到清末民初之际，为向普通民众普及科学、民主等西方现代观念，许多知识分子所办的宣传刊物还大量采用图画形式，一时画册、画报风靡于世。

事实上，从宋代起，古书上的图画开始

逐渐减少，人们更重视文字的作用，但“图书”的说法还是一直沿用了下来。

孔子晚年删诗书，是在破坏文献吗？

孔子周游列国 14 年之后，晚年回到鲁国，在教学之余，整理编辑了《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6 本书。其中，他对于《诗经》《尚书》两本书的改动最大。“删诗书”一说，说的便是他对于这两本书的编辑。

关于“删诗”，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经》原本有 3000 多篇，孔子删去了重复的和不符合礼仪的，留下了 305 篇，然后为之分类并调整次序，最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诗经》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大约形成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经》中的“风”部分，属于民间文化。民间的文化最容易并大量产生的，便是爱情类的诗篇，甚至不乏一些“越礼”的东西。这类诗歌肯定是不符合孔子的“礼仪”之道的，另一方面，此类诗歌也容易因主题雷同而产生重复，因此，可以推测孔子“删”的可能主要是这部分。从这点来说，孔子的“删诗”使大量先秦古人原汁原味的文化失传，的确是一种遗憾。

而关于“删书”，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是指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政治做了总结，然后从三代的文献中选择了部分内容，按照自己的思想与逻辑，选编成书。这种行为从现在的编辑工作来看，是难免甚至必要的。因此孔子的“删书”便不能说是一种破坏。

总体而言，孔子“删诗书”，应该说没有破坏文献，而是对于古代文献的一种保存和传承。春秋时期，总体上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如果不是孔子将这些书编辑整理，并将之作为教材广泛传播，恐怕这些文



献也很难流传到现在。另一方面，孔子对于这些文献所做的筛选、编订次序、写序的工作，使这些文献的含义更加清晰、文理更加通顺、结构也更加合理，而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是积极而深远的。

“诗三百”指的是什么？

提起“诗三百”，可能许多人马上想到《论语》中的那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表明孔子不仅是个深邃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一流的文学评论家。“思无邪”，短短三个字道出了诗歌的本质，无论古代诗歌还是现代诗歌，其实质都不过是这三个字。

“诗三百”即《诗经》，编撰于先秦时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名称本来是《诗》，后来可能因总共有 305 篇，时人取其整数称其为“诗三百”。西汉时，儒生们出于对孔子的尊敬，将之称为《诗经》，因为“经”在古代乃是对特别尊崇的书的称呼。

《诗经》里的诗其实本是用来配乐的歌词。因此，“诗”本身衍生于“歌”，这也是“诗”被称为“诗歌”的原因。按照音乐性质，《诗经》被大体上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歌，产生于民间；雅，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多由贵族文人创作；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全部由贵族文人创作。

《诗经》中的诗歌写作年代是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 500 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对于 2000 多年前的政治经济、战争徭役、祭祀典礼、世俗人情、生产生活等均有所涉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穆天子传》是西周的作品吗？

《穆天子传》是一部记录周穆王西巡史

事的著作，书中主要记载了周穆王的一次“旅行”。据书中介绍，周穆王率领部众，坐着马车，从洛阳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河套地区，穿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与西王母国的女王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原型）会面后，周穆王等又一路返回洛阳，整个行程达十九万里（周朝的“里”略小于现在）。

《穆天子传》是由晋代的盗墓贼从今河南汲县一个战国时代的古墓中发现的。当时西晋的学者异常兴奋，纷纷为之做注。但到宋代之后，由于疑古风的兴起，开始有人怀疑《穆天子传》的真伪；到清代，学者姚际恒等更是力主《穆天子传》为伪书。怀疑派的理由主要就是周穆王的行程实在太远了，不太可信。而这种说法一度成为定论。

但是，进入现代之后，对《穆天子传》有了新的说法。学者常征在将《穆天子传》与后世的《水经注》等地理著作对照后，发现其中的山川村落都可一一考证出。并且，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了周穆王去昆仑山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说得通的动机的。周朝非常重视玉器，而昆仑山早在上古时代就一直是传说中的美玉产地。如此，周穆王前去昆仑山寻玉，便是十分可能的。

古代的图书是什么样子的？

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介绍，孔子晚年研究起了《周易》，而且到了痴迷的程度。说孔子因为翻阅《周易》次数太多，以至于“韦编”断了三次。“韦编”具体是什么东西？怎么翻书多了，“韦编”就断了？这还要从中国早期的图书说起。

我们知道，中国的造纸术到汉代才发明。在这之前，中国人虽然早就创造了文字，但是传播起来并不方便。开始，人们将文字写在甲骨、石头、金属上，这样的文字载体作

为保存资料的性质，还勉强凑合，但在使用的过程中，无论是阅读，还是携带都相当困难。这些东西也很难称得上是图书。大概从周代起，人们开始用竹片作为文字的载体。这种载体使阅读方便了很多，而且竹片的形状可以削得比较规则，连在一起之后还可以卷起来，看上去也像个书的样子了。因此中国最早称得上图书的便是这种竹简图书。

竹简图书是将竹子劈成一片一片之后连在一起制成的。一根竹片称为“简”，多根“简”用绳子编起来便成“册”。“册”是个象形字，表示竹片穿起来的样子，同时，也称作“编”或者“篇”。其中，用丝绳将“简”编起来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好的图书，再卷起来便成为一卷。文章长了，则可以多分几卷。至今，卷、篇、册这些说法还是形容图书的量词。而现在许多与书有关的字都有竹字头，比如书籍的“籍”、户口簿的“簿”等。

这种竹简图书的容量非常小。一般而言，一片简上都只能竖写一行字，一卷竹简正反两面写，也就几百字。因此这种图书虽然比骨头、石头方便些，但还是笨重得很。据说秦始皇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后，每天要看100多斤重的竹简文书。西汉时的文学家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奏章，用了将近3000枚竹简，只好找人吃力地抬进宫去。由此可见，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听起来挺吓人，实际上现代的许多喜欢阅读的人可能就已经做到了。

《论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论语》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全书约1.2万字，共20篇，大部分内容是孔子对于其弟子所提问题的回答，因此也可以说这本书是孔子几个弟子的课堂笔记合在一起的集子。另外书中也记录了一些孔子弟子的言行。书中的语言言简意赅、含蓄

隽永，对于孔子的政治理想、伦理主张、道德观念以及教育原则等均有所反映，并生动地刻画了孔子和一些弟子的人物形象。《论语》刚开始在儒家经典中地位并不高，一度被称为“小经”，南宋后因为理学家朱熹的推崇而日渐成为儒家“第一经”。其博大深刻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以及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

至于《论语》究竟编纂于何时，由谁编纂，历来说法不一。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汉书·艺文志》中的“众弟子咸记之”。这里的众弟子，不少学者推测为仲弓、子夏等人。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论语》为孔子弟子曾子和有子两人的门人所作。因为在书中，除孔子外，只有这两人被尊称为“子”，并且书中记录两人的言论也比较多。唐代的柳宗元则进一步认为《论语》为曾子及其弟子所编，因为书中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宋代理学家“二程”与近代的思想家梁启超也持此观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是曾子门人讲述，由秦汉儒生编辑总结而成。

而关于《论语》的成书时间，目前只能推测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论语》里不仅记录了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而且记录了孔子的弟子子夏、子张、曾子等与再传弟子之间的对话。这其中，子张小孔子48岁，子夏小孔子44岁。他们收有学生，应该是孔子死后许多年了。另外，《论语·泰伯》篇中记载有曾子病危将死时与弟子孟敬子的对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儿子的谥号，他死于战国初期，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左右。因此，《论语》成书应该在公元前400年前后。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论语》应该是在战国初期，孔子死后大约60年，由其弟子或再

传弟子，或者弟子与再传弟子一起集体编辑而成的。

古代为什么要焚书禁书？

提到焚书禁书，可能人们马上想到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焚书禁书，秦始皇既非最早，也非独有。在秦始皇之前，秦孝公早就焚书在先；在秦始皇之后，南朝梁元帝、北魏太武帝、唐武宗、清代乾隆皇帝等统治者都曾发动大规模的焚书禁书运动。另外，除皇帝外，一些大臣也扮演了禁书的帮凶。至于历次禁毁的原因，则不一而足。

据《韩非子·和氏》记载，秦孝公曾听从商鞅的建议，下令焚烧《诗》《书》，以此来“明法令”。这是一种愚民政策，让人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只唯政府法令马首是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烧书。

接下来的秦始皇的焚书与禁书，尽人皆知的。秦始皇焚书禁书更是明目张胆的愚民政策了。秦始皇打算将秦王朝传万世的，这些“祸乱人心”的诸子百家之作自然需要烧毁了。

北魏太武帝、唐武宗两皇帝焚书则比较特殊，他们焚书则主要是为了灭佛，主要烧的也多是佛经。南朝梁元帝的“焚书”的理由则令人啼笑皆非。公元554年，西魏南下攻梁，梁军节节败退。梁元帝觉得自己读书万卷还要亡国，那读书还有何用？于是烧了14万册书籍。

许多人可能以为编纂《四库全书》是乾隆的伟大功绩，殊不知，乾隆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焚毁各种典籍达71万卷之多，乃历代焚书规模最大的一次。所以鲁迅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除皇帝之外，大臣烧书的也不少。北宋蔡京、南宋秦桧掌权时，都曾禁书、焚书。尤其是秦桧，前后焚书11年。事实上，历

史上的焚书禁书，远远不止这几次。总体而言，古代皇帝大臣的焚书禁书，一般都是出于一种牵制人们思想、维护统治的需要。

从孔子故宅壁发现的藏书是伪造的吗？

关于孔子故壁中发现藏书的故事，有一个专门的成语，叫“鲁壁藏书”。

公元前213年前后，秦始皇为加强集权统治，采取了焚书政策，下令焚烧除《秦史》以外的列国史记，并严令民间限期内交出《诗》《书》等并销毁。这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眼看经典面临失传，便偷偷地将《尚书》《礼记》《论语》及《孝语》等书藏于孔子故宅的墙壁内，然后投身到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中。后来起义失败，孔鲋被杀于嵩山，也有传言说他藏书后便到嵩山隐居终老。

几十年后的西汉景帝三年，景帝之子刘余被封为鲁王，史称恭王。鲁恭王喜欢建造宫室，孔子故宅附近因多有弟子种植的奇树，环境宜人，被他看中。鲁恭王便在孔子故宅处建造宫室。在拆除孔子故宅时，孔鲋所藏的书被发现。据说这些藏书重见天日时，天上突然有丝竹金石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刘余当即被震慑住了，再也不打孔子故宅的主意。

据说这些经典是用时人不识的先秦蝌蚪文写成，被称为“孔壁古文”。后来，孔子的十一代孙孔安国将这些古文重新译出，发现这些书与当时民间所保存的有所不同，其中最价值和影响的是《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要多16篇。

后来，为纪念孔鲋藏书，金代人在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名为“金丝堂”，明代时又修建“鲁壁”，作为纪念孔壁藏书的象征性遗址。

“鲁壁藏书”的故事一直为历代文人所

津津乐道，宋代文学家王楙称曾在其《鲁壁铭并序》中称：“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以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他将秦始皇焚书之后的文化复兴之功归之于“鲁壁”了，这自然增加了这个传说的传奇意味，不过未免有些夸张了。

曹操为什么要赎回蔡文姬？

三国时期的刘备、孙权、曹操三雄之中，最有文化修养的大概要算曹操了。曹操是建安文学领袖之一，非常重视有才华之人，而尤其使其留下千古美名的，则是花重金赎回一代名媛蔡文姬。

蔡文姬，字昭姬，陈留人（今河南开封一带），东汉文学家蔡邕之女。蔡邕不仅擅长文学，还精于天文数理，妙解音律。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是典型的才女。蔡文姬初嫁江东卫仲道，不幸仲道早死，蔡文姬回娘家居住。后来出现十常侍之乱，接着董卓入京为祸，东汉朝廷一片混乱，蔡邕在乱中被王允杀掉。时年23岁的蔡文姬被胡骑所虏，在匈奴成为左贤王妻子，待了12年，并生下二子。

曹操与蔡邕是挚友。蔡文姬在匈奴的12年里，他扫平了中原，迁都许昌，并“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得知了蔡文姬的消息后，派人出使匈奴，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蔡文姬赎了回来。之后，又亲自做媒，让蔡文姬再嫁田校尉董祀。

曹操赎回蔡文姬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因为他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好朋友。蔡邕当年在洛阳大名鼎鼎，俨然文坛领袖。曹操对其十分佩服，经常到蔡府拜访，与蔡邕亦师亦友。因此可以说，曹操赎回蔡文姬自然有感念旧友的因素。但是，除了感情的因素，

则还应该看到另一因素。由于当年董卓火烧洛阳，无数文化典籍遭毁，而其运往长安的70余车图书也遇雨废毁。董卓死后，其旧部长年互斗，以致“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曹操凭武力使中原地区摆脱战乱，极力想复兴文化，而蔡文姬的才华他自然是知晓的，他之所以花重金赎回蔡文姬，更重要的是爱惜她的才华。而蔡文姬后来凭记忆为曹操重新写出了遭毁坏的400多册图书，也算是回报了曹操了。

“洛阳纸贵”说的是什么？

“洛阳纸贵”的故事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说的是西晋泰康年间，洛阳一个叫左思的文学青年写了一篇叫《三都赋》的文章，由于写得太好，时人争相传抄，结果竟然导致洛阳市面上的纸一下子涨了两三倍。对于一个写文章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荣耀呢？

《三都赋》是汉代流行的赋体文，该文从历史、地理、物产、风土人情等角度，对三国时期的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进行了描写。全文总共1万多字，对3个都城的描写分别成篇，构思巧妙，文笔精当，乃是千古名篇。

左思小时候不但其貌不扬，身材矮小，而且看上去脑子也有些呆呆的，实在没人相信他会在文学上或者其他任何事上有所成就。做御史的父亲就一直对他非常不看好，经常在朋友面前说后悔生了这个儿子。左思长大后，他父亲还对朋友讲：“唉，左思虽然成年了，但他现在的知识和才能，还不如我小时候呢。”

左思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不服气，暗暗发奋。他看到当时流行的东汉班固写的《两都赋》和张衡写的《两京赋》，虽然佩服其宏大气魄，可也看出了其中华而不实、大而



无当的弊病，于是他决定自己写一篇同类型但更朴实的《三都赋》。左思先是广泛搜集资料，然后闭门写作十年，文章始成。

一开始，因为左思名不见经传，文章并不被时人认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陆机还讥讽他的文章只配给自己盖酒坛子。不甘心的左思带着自己的文章前去拜见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张华，得到了赏识。张华还将左思的文章推荐给皇甫谧，皇甫谧也很欣赏，并亲自为之作序。

直到这时，《三都赋》的价值才被人发现，一下子火了。《三都赋》字数不少，毛笔字又相当占纸，而且当时的纸刚刚发明，市面上可能本也不会太多，因此因此在短期内涨价，想必并非夸张。后人便用“洛阳纸贵”来形容某人的文章写得不得。

人们为什么把底本叫做“蓝本”？

“蓝本”一词，原是古人印刷书籍过程中的一个专用词。

在古代，人们称雕版或活字版印刷的图书为“版本”。因版印书一般为墨印，故又称“墨本”。明清之际，技术进步，出现了红色、蓝色印本，分别称“朱印本”“蓝印本”。这种“朱印本”“蓝印本”并不批量印刷，而是在用以印刷的模板做好之后，刊刻人先以红色或蓝色印出几本，用作校对之用，以改正模板中的错误，相当于现在印刷过程中的“校样”。定版之后再用墨印正式批量印刷。《书林清话》载：“其一色蓝印者，如黄记《墨子》十五卷……此疑初印样本，取便校正，非以蓝印为通行本也。”因这些本子是一部书成版以后最初印制的，常称为“初印红本”、“初印蓝本”。又因“初印蓝本”最常见，所以，人们便把印刷工作底本简称为“蓝本”。

后来“蓝本”一词逐渐演变，不再局限

于印刷领域，引申为一种泛泛意义上的原始的参照物。

“牛角挂书”的典故源于何处？

“牛角挂书”是发生在隋末农民起义中的瓦岗军后期领袖李密身上的故事。李密，字法主，京兆长安人。李密祖上本是北周和隋朝贵族，到他这代时，已经衰落了。凭借着祖上的荫庇，李密在大概15岁时得到一个武职，在隋炀帝宫里当差。有一天，隋炀帝看到李密后，觉得这少年天性太活跃，怕他在宫里惹事，就将他赶出宫去。于是李密回家以放牛为生。不甘心就此潦倒一生的李密一边放牛一边发奋读书。一天，李密听说侯山住着一位叫包恺的饱学之士，就骑上一头牛前去求教。牛背上铺着用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书》。当时的越国公杨素骑着马在李密后面赶路，看少年如此用功，便悄悄勒紧马缰在后面跟了一段。杨素发现李密自始至终读得十分投入，便忍不住赞叹道：“谁家的少年如此刻苦！”李密在宫里当差时见过越国公，于是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拜见。杨素问李密在读什么，李密告诉他自己正在读《项羽传》。杨素与李密交谈了一会儿，发觉李密谈吐不凡。回家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个人的学识才能，都在你们兄弟之上，你们可以和他交往一下。”后来杨玄感果真前来结交李密，两人成了朋友。这就是“牛角挂书”的故事，被记录在《旧唐书·李密传》中。后人以此激励年轻人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要坚持学习。

《百家姓》排列顺序有什么说法？

《百家姓》相传由北宋初年吴越钱塘地区的一个书生所编撰。书中将常见的姓氏编

成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短文，读来朗朗上口，易学好记，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其与后来的《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书中之所以按照“赵钱孙李”的顺序排列，并非依据各姓氏人口数量，而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

据宋人王明清考证，《百家姓》之所以将赵排在第一位，乃是因为当时宋朝皇帝为赵匡胤，赵乃国姓。而在宋朝建国之初，还另有政权并存。浙江有称王吴越国的钱镠，另外还有定都金陵的南唐后主李煜，所以钱、李二姓也被排在了前面。而据说编写《百家姓》的书生是钱塘人士，就将吴越王钱镠的正妃的孙姓排在了李姓之前，最终形成“赵钱孙李”的顺序。接下来的“周吴郑王”则都是钱镠的其他后妃的姓氏，而后面的姓氏安排都大抵受当时门第政治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流行世家门第政治的魏晋南北朝以后，人们非常重视姓氏，因为它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家族地位，是一个人参加社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名片。唐代曾以政治地位排出过名门八姓，彼此世世通婚。因此姓氏排序也便不可马虎半点了。当时朝臣编撰《氏族志》时，曾按旧日大族顺序在最前面分别排出“崔、卢、李、郑”四姓，惹得唐太宗很不高兴。朝臣只好按新的次序重新排列，自然，李姓被排在了第一位。而明代所编写的《千家姓》，也将朱姓排在了第一位。

需要说明的是，《百家姓》中并非只有100个姓氏，“百”只是一种泛称，并且其具体的数目在不同的朝代也有所不同。最初的《百家姓》收录了411个姓，至元代，由于连年战火，留下来的版本残缺不全，数目有所减少；明代版本则又做了增补，记录总共438姓，其中408个单姓，30个复姓；清人又进一步增补到504个，包括单姓444个，复姓60个，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百家姓》了。

《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

要说中国乃至世界古往今来最为神秘的一个笔名，大概要算兰陵笑笑生了。这个署在明代小说《金瓶梅》上的名字，几百年来，成了诸多金学家和普通读者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也难怪，《金瓶梅》在万历年间一问世便被誉为“第一奇书”；另外，其又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第一部将目光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身上转移开，投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地位极高。

目前为止，历代学者对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共提出了60多种说法。我们简单介绍几种主要的。

“嘉靖名士说”。虽然具体人选不定，但几百年下来，金学家们对于这位兰陵笑笑生的在世时间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位嘉靖年间的名士。另外，因书中多山东口语，不少学者推测作者是山东人。并有人进一步做出推测，认为作者是山东峄县人。由此，不少学者认为《金瓶梅》作者该是明嘉靖年间山东峄县的一个名士。至于具体人选，有人提出是山东峄县人贾三近，他曾任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是个名士。也有人认为是贾三近的父亲贾梦龙，因为他的生卒年代与《金瓶梅》成书时代基本吻合，他创作的诗词也可在《金瓶梅》中找到。还有人认为是明代著名诗人谢榛，他是山东临清人。

除“嘉靖名士说”，被多数人认可的便是“王世贞说”了。王世贞是嘉靖年间的著名文学家。传说王世贞的父亲被权臣严嵩害死。王听说严嵩的儿子喜欢看淫书，为替报父仇，写了《金瓶梅》，并在每页书上抹了毒药后，把书送给严嵩的儿子。严嵩的儿子一边沾吐沫一边翻书，最后被毒死。这是流传范围最广也是流传时间最长的说法。这个故事本是对一些明清学者经考证得出的“王世贞说”观点的附会，因此此观点本身并非

无稽之谈。

“屠隆说”。屠隆是明代著名戏曲家，为人放荡不羁，豪放好客，纵情诗酒。此说也比较流行。

“李开先说”。李开先也是有名的戏曲家，山东章丘人。这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

此外，冯梦龙、唐伯虎、汤显祖这些著名文人也都有人怀疑是躲在兰陵笑笑生后面的神秘人。总体而言，这个谜至今还未解开。

天一阁创建于何时？

天一阁乃是古人留下的一座私人藏书楼。古代文人普遍有藏书的爱好，所谓“黄金散尽为收书”。尤其是做了官的文人，因为经济实力，往往都有不小的藏书量。

范钦在嘉靖朝任兵部右侍郎，在退休后，他回到家乡宁波，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建造了天一阁。之所以取名“天一”，倒不是因为范钦决心将他的藏书楼建为天下第一藏书楼，而是取义于汉郑燮《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名字无意中应了“天下第一”的含义，天一阁后来还真成了天下第一藏书楼。

因为禁止外姓入阁，天一阁的书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才有幸成为外姓人登阁第一人。自此以后天一阁才进入相对开放的时代，但仍只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才被允许登阁参观，因此明清大学者均以登阁为荣。

后来清乾隆皇帝下诏修撰《四库全书》时，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从此名闻全国。

四大奇书具体指哪四部？

“四大奇书”，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本古典长篇小说，因为均为明代人所写，又称“明代四大奇书”。这种说法最早由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提出。所谓“奇”者，除了指内容和艺术上的新奇之外，还指这几本书对于小说体裁本身的开拓。“四大奇书”分别开创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历史演义传统、英雄传奇传统、神魔小说传统、世情小说传统四大传统。

《三国演义》写于明初，由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和有关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写成，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小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气势雄浑，娓娓道来。

《水浒传》也是创作于明初，作者施耐庵。同《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是在民间故事和话本、戏曲基础上创作而成。《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讲述了政治上一个永久的话题——合法政权体制内的反叛者与政权的关系。该小说被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评为“六才子书”之中的“第五才子书”，并被其从一百回删减至七十回。

《西游记》先是由许多民间艺人口头创作，在嘉靖年间，由吴承恩最后完成。它是中国最优秀的神话小说作品，书中借助唐朝僧人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故事，融佛道于一炉，幻想出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

《金瓶梅》不同于前面三部的集体创作，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成书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至今不知究竟为何人。《金瓶梅》的题材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演化而来，是第一本将目光投向市井小人物的小说。《金瓶梅》对后世小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红楼梦》就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因其淫秽内容太多，成为明清以来历代禁书。

孤本、善本是什么意思？

“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世间只此一本的古代书籍，便是孤本。并且，不仅“孤”，还要有价值。举例来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本来是写完了的，但被乾隆皇帝毁去了后面的四十回，现在的版本的后四十回系高鹗续写。如果谁手头有曹雪芹的全本《红楼梦》，便是“孤本”。但如果是一本无足轻重的书的唯一手稿，则未必是“孤本”。

“善本”的定义要稍微复杂一些，总体而言，可归结为两个标准，一是内容上无讹讹，二是注解上能更接近文章本义。

所谓无讹讹，一方面是指完整，既没有遗漏，也没有多余，这是针对书在印刷或抄写时可能在校对方面出现的错误而言；另一方面，是指书本身与原文文字符合，这是针对书的内容在传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而言。因为时间越早的版本在文字上应该越接近原书，因此，《文物法》规定，凡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版的图书，都在国家法律保护之内，不得走私出口。这里只是在时间上大致划定了一个界限，并不绝对，1795年之前的书未必便是“善本”。

而在注解上更接近文章本意，则是从人们对书的内容的理解的角度来说的。因为许多古书因成书久远，读起来文字障碍颇多，要想看懂作者原意，往往需要借助前人注疏。比如我们现在所阅读的先秦著作，大多都需要借助汉代以来的注解。因此，这个注解的版本也相当重要。一般而言，自然是学问越高的人做的注解越好；另一方面，那些御用文人受政治力量驱使而做的穿凿附会的解释则没多大价值。因此，注者不受政治干扰、思想独立也至关重要。

除以上两个标准，也有人从印刷技术、用纸敷墨、装帧技巧等方面考虑，认为古代印刷、装帧得比较好，或者纸张、墨水精良

的书也算是“善本”。这是从书籍本身的艺术性来看的。

《古文观止》中的“观止”是什么意思？

《古文观止》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观止”二字，出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吴季札在鲁国欣赏周王室的音乐，看到舞蹈《韶箭》时，他赞叹：“德至矣哉！大矣。”认为此舞无美不具，接着又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思是这些音乐舞蹈美妙到了极点，其他的都不必看了。后人便以“观止”二字称赞所见事物尽善尽美，无以复加。“古文观止”便意指这些文章已经是古文中最好的，其他文章都不能超越。

事实上，《古文观止》里所选的文章整体上确实代表了中国文言散文的最高水平，也是当得起“观止”二字的。该书由浙江绍兴的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在清康熙年间共同选编而成。二人乃是教书先生，选编《古文观止》本是用作教授学生写作的教材的。

《古文观止》全书收入上起周代下迄明末的历代优秀文章222篇，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整体面貌。入选本书的都是历代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其中，西汉以前的文章左丘明的《左传》选录34篇；加上其他先秦作品，先秦作品总共有70篇，占《古文观止》全书的1/3，对两汉的文章，编者比较重视司马迁的《史记》，选了14篇；唐代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为主；宋文以欧阳修、苏轼为侧重点；秦文仅选李斯一篇，六朝文章选6篇，元代一篇未选，明代选入18篇。

《古文观止》之前的古文选本，大多依据昭明太子萧统《文选》的体例，分类繁琐，



常以条目为主线,阅读使用都很不方便。《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阅读方便,查看快捷。在问世后的300多年里,成为最流行、最有影响的初学古文选本,常作为私塾及学堂的启蒙读本。另外,在书中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批注,也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

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吗?

现代社会,图书馆是一个常见的机构。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面向全体市民的公共图书馆,每个学校也都有图书馆,连一些大的企业也有图书馆。那么,在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吗?

其实,早在周朝就已经有图书馆了,当时称为“盟府”,也叫“故府”。而当时的图书馆长则称作“柱下史”。道家创始人老子所担任的周朝守藏室之史,其实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图书馆消失。至汉代,朝廷又开始建图书馆,当时称“秘阁”、“秘府”,设专职官员管理。之后,直到清末,政府图书馆再也没有消失过。其中,尤其唐宋明清四代,图书馆得到极大发展。唐代,像魏徵这样的大臣都出任过“图书馆长”之类的职务,专门负责搜集收买天下之书,并组织人抄写备份。据说,当时的“图书馆”还专门聘用女子管理员。宋代,太宗建立崇文院,专作藏书之地,后来又另设书库,叫秘书阁。明清之际,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国家藏书得到空前发展。明朝朝廷的“图书馆”叫文渊阁,其中收入中国最大的类书、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代统治者为了体现对文化的尊重,收买汉族文人之心,在全国各地建有七大藏书阁。

除官方图书馆,民间图书馆也广泛存在。具体有三类,一是书院图书馆,二是私人藏书楼,再就是寺庙里的藏经楼。

自唐代直到清末,书院作为中国一个独特的教育、学术机构,自然是少不了图书馆的。岳麓书院的御书楼直到现在都藏有大量图书。而私人收藏家们的图书也相当可观。宋代著名的个人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卷,并且公开允许爱书之人借阅;明朝官员范钦建造的“天一阁”,到今天已成为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另外,寺院里的藏经楼,并非如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藏的都是武功秘籍,并且也不止佛经,而是收藏各种书籍,也称得上图书馆了。

邸报是中国古代的报纸吗?

说起报纸,可能许多人以为这是在清末才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代文明。殊不知,中国很早就已产生了报纸,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报纸的国家。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便产生了一种专门传递军政信息的“邸报”,实质上便是早期的报纸。西汉沿用了秦朝的郡县制,各郡行政长官为与中央联络方便,在京城长安都设了专员。这些专员的职责便是负责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的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传递给各郡长官。因为这些驻京专员的住处当时称为“邸”,于是这些传递消息的竹简或绢帛便称为“邸报”。“邸报”自西汉产生之后,在后世历代名字时常变化,却从未消失过,并且性质与内容也变化不大。

唐开元年间,中央政府为方便官员了解消息,每天都将朝务以简讯形式公布在宫门上,时人称为“开元杂报”。这便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朝政公报,相当于早期的政府新闻发布会。而从新闻的时效性上来说,这已经接近现代报纸,相当于现在的日报了。到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中央失去权威,

各地驻京城人员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朝政信息，而是开始主动采集消息写在“邸报”上。

宋代，报纸开始正式化并多样化。朝廷专门组织了一个进奏院，负责定期向全国官吏发送一种“进奏院状报”。另外，宋朝统治者还初步规定了一套新闻检查制度。

明朝政府开始允许民间自设报房，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报房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邸报”稿件公开发售，通称“京报”。内容由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官吏的奏折三部分组成。明代中叶后，办报成为社会上的一项公开职业，明末的“京报”还曾刊载过社会新闻。清代的“京报”则进一步繁荣，在京城达到十家之多。清末，西方现代报业观念被引入中国，民间报纸兴起，中国报纸开始与现代报业接轨。

《四库全书》的下落如何？

《四库全书》乃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清乾隆年间，清朝国力正值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怀着整理文化典籍和销毁“反动”书籍一公一私两个目的，组织大量人力财力，耗时近10年，编修了《四库全书》。其中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而这么多的书整理在一块，总要有个章法，“四库”正是对这些图书的分类方法。“四库”又称“四部”，分别是经、史、子、集。这是中国自汉代以来形成的比较普遍的图书分类方法。《四库全书》的“四库”之下又分许多小类。经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史部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子部包括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著述，及部分佛、道典籍、古代小说等；集部包括楚辞、汉赋、骈文、唐宋

诗词、元曲、历代文集等。

《四库全书》修成后，乾隆命人抄成7部，分别藏于清代南北七大藏书阁，即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北四阁）和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南三阁）。之后，这7部《四库全书》伴随着康乾盛世的余光，在安定和荣耀中度过了半个世纪。此后，在中国近代连绵不断的战争炮火中，厄运不断。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经多次修补后恢复，但仍然散佚过半，目前藏于浙江省图书馆。文渊阁本原藏于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被政府调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总体算起来，7套《四库全书》目前还存三套半。

文房四宝具体指哪四宝？

现在我们提起“文房四宝”，往往会泛泛地以为就是指笔、墨、纸、砚四件古人用来写字画画的工具。其实，文房四宝一开始并非是一种泛指，而是指特定的四种笔墨纸砚。

文房四宝之说，最早起于南北朝时期的南唐。据《南唐书》记载：“南唐时推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纸、江西婺源龙尾砚为文房四宝。”后来，随着时代变迁，文房四宝的具体所指有所变化。北宋以后，“文房四宝”指湖笔（浙江省湖州）、徽墨（安徽省徽州）、宣纸（安徽省宣州）、端砚（广东省肇庆，古称端州）。并且这时的“文房

四宝”不再仅仅是一种写字画画的工具，而是逐渐成了一种融汇绘画、书法、雕刻等艺术的艺术品。

古代文人用毛笔写字画画，相当不容易，笔、墨、纸、砚缺一不可。因此文人历来都非常重视这四样东西，购买时要精心挑选，久而久之，一些品质好的便得到公认。再后来，这四样东西逐渐具备了艺术的价值之后，一些文人得到上品，更是当成宝贝藏着。唐代才女薛涛曾专门作诗《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煤而黯黯，人文亩而休休。”诗中所歌咏的就是砚、笔、墨、纸。

后来，随着制作工艺的纯熟，优质的笔、墨、纸、砚种类逐渐增多，不止一种，“文房四宝”就逐渐成了笔、墨、纸、砚四种工具的泛称。另外，既然是文人用品，自然少不得有了一些诸如“文房四士”之类的文雅别称。宋代陆游诗云：“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什么是正史？

正史，就是被官方认定为正宗和正统的史书，最早将正史作为史籍类名的是《隋书·经籍志》。正史有确定的范畴，宋代时有十七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到明代，增加了《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成为二十一史；清代又增加《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明史》，遂成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正史最为通行的说法；民国时，增列《新元史》，而有的地方则是将《清史稿》列入，于是又有二十五史之称，如果将这两部书都加进去，就是二十六史。在唐代以前，正史一般为私人撰写，如《史记》为司马迁所著，《汉书》

为班固所著，《后汉书》为范曄所著，《三国志》为陈寿所著。自唐代以后，正史就开始由官方组织编写，如《晋书》，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编者共有21人；再如《隋书》，先由魏徵监修，后由长孙无忌接续，编写者则有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颜师古等一大批知名的学者；唐代以后的正史中，私修的仅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很少数的几部。官修的正史往往由当朝宰相担任主编，因为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宰相依凭自己的身份可以进行裁夺。虽然正史中难免存有部分曲笔和隐讳，但是它的权威性仍是其他史书所无法比拟的。正史的撰写所依据的资料是最原始的，也是最全面的，而且正史的编撰者一般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史学家，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正史占有基本性的地位。

什么是杂史？

杂史的提法，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杂史之杂，体现于2个方面，在形式上，杂史的体例不像正史和别史那么严谨，往往不同于正史和别史常用的纪传、编年、典志等体例；在内容上，杂史不限于以一朝一代或者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大事为主，而是涉及得非常广泛，包括学术史、科技史、方域史、地理志等多种具有专属领域的史著。杂史或者因为在体例上和内容上都较为随便，有着更大的灵活性，从而记录了许多不见于正史和别史的珍贵资料，或者因为有着专攻的对象，而比正史和别史中相关方面的内容记载、讲述得更加细致，由此体现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逸周书》《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大唐西域记》《明儒学案》《大清一统志》等都是非常著名的杂史。

什么是别史？

别史，指的是官定的正史之外有体例、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别史”之称最早由南宋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題》中提出，别史与正史区分的标志就是是否经过官方的命定，例如，在清朝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之前，《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只能算别史，而经过乾隆的谕旨，这2部书则跻身于正史之列。至于别史与杂史的区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关系一朝大政者入别史，私家记录中多碎事者入杂史。”正史的体裁均为纪传体，而别史的题材则较为多样，如《续汉书》为纪传体，《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典》为典志体，《宋史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明实录》为实录体，《唐会要》为会要体等。

什么是野史？

野史是一种习惯的称谓，并非史籍中正式的分类，一般指私家所撰的涉及史实记录的笔记、史传、杂录等。野史的内容，大多为作者耳闻目睹或者道听途说的逸闻趣事，往往不见于正宗的史籍，虽然野史的记载充斥着相当多的讹误和谬传，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所反映出的历史真实的一面，其中蕴藏着的大量正规史书中难以见到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的细节，可以为后人了解历史提供另一种角度的观照，因而自有其不凡的价值。鲁迅先生就非常看重野史，甚至认为若要正确地了解中国历史的真相，是非得读一读历代的野史不可的。

什么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情景的史书体裁，首创于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将先秦时期的史书所具的各种体裁融于一书，分作“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个部分，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构成书的主体，“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是全书的总纲，“世家”记载的是诸侯和一部分虽然不是诸侯但在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的人物（如孔子、陈胜），“列传”又分为专传和类传，记载历代名人、三教九流的事迹，并且涉及到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方面的内容。班固作《汉书》，沿用了《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造，将“本纪”改称为“纪”，取消“世家”，将“列传”改称为“传”，将“书”改称为“志”，于是形成了“纪”“传”“表”“志”为历代正史所遵循的史书体例。

什么是编年体？

编年体，是一种以时间为线索的史书体裁。相传为孔子编写的《春秋》就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编年体可谓起源很早，而且历代延续，是许多重要的别史所采用的体例，如最为著名的《资治通鉴》。编年体具有时间连续的优点，给人一种清晰的历史时序感，但是也容易造成对一些具有前后相续性质的历史事件的分割，并且因此对相关事件的原委也难以叙述得较为完整，而这方面正是纪传体的长处所在，所以历代正史采用的不是编年体，而是纪传体。当然，纪传体也有缺点，可以说编年体与纪传体在优缺方面恰为互补。

什么是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纲的史书体例，首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将《资治通鉴》中分年记载的一个体系的事迹集中在一起，

自成一个单元，以显事情的本末。这样一来，就消除了《资治通鉴》原书中记事不连贯的缺点，而体现出鲜明的条理性，这也就是纪事本末体的优长之处。袁枢撰写《通鉴纪事本末》，在内容上并没有进行增改和修订，可是他所创造的这种新的史书体裁问世之后却备受欢迎，此后，纪事本末体的史书蔚为大观，基本上各代的历史都有与其相对应的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出现。

什么是典志体？

典志体，是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司马迁创作的《史记》中有“八书”，其中就有典章制度方面的记录；班固著的《汉书》中有“十志”，记载的内容与《史记》中的八书基本上是相对应的。东汉以后，出现了典章制度的专史，如应劭的《汉官仪》、丘仲孚的《皇典》、何胤的《政礼》等。唐代前期出现了很多典志方面的书籍，如李林甫的《唐六典》、王颜威的《唐典》、刘秩的《政典》等。但这些都是关于某一朝代的典章制度的记叙，从单独的某部书中并不能窥知历代典章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情况。中唐时期杜佑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编成了一部上起黄帝、下至唐代宗的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这是典志体正式创立的标志。南宋郑樵又编纂了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后改名为《通志》。尽管《通志》并非典章制度的专史，但是其中作者用力最多也是最受人看重的精华部分是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的“二十略”，因而史学家们将其与《通典》和《文献通考》这两部专史合称为“三通”。《文献通考》是元代马端临所撰写的又一部通史式的典章制度的专史，其创新之处在于采取了“文”（历史资料）、“献”（史家评论）、“注”（编者注解）三结合的方法。清朝乾隆年间组织学者续编“三通”，纂成“续三通”，而

后又有《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这“清三通”，共成为“九通”，再加上民国时刘锦藻编写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是学界习惯称谓的“十通”。

什么是会要体？

会要体是典志史书的一种题材，“会要”就是会聚朝廷典章制度之要的意思。会要体创始于唐德宗年间苏冕编纂的《会要》，《会要》记载了唐高宗到唐代宗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唐宣宗时，崔铉等人又奉诏编写《续会要》，续增了唐德宗到唐宣宗时期的相关内容。北宋初年，王溥在这两部会要的基础上，编成《唐会要》，后来又编写了《五代会要》，使得会要体史书趋于完善。宋代以后，官方都要组织学者编纂当朝的会要，如《宋会要》（原本已佚，清代学者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宋会要辑稿》）、《元经世大典》《明会典》《清会典》等。另外，一些学者又私自编写了此前历代的会要，如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明代董说的《七国考》、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等等。会要体史书，基本上是以15个左右的门类再具分为300余个目，记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教育、礼乐、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及其沿革情况，兼有工具书和资料汇编的功能。

什么是学案体？

学案体，是一种记述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是继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主要史书体裁之后出现的又一新的史书体例，始创于明末清初，黄宗羲撰写的《明儒学案》即为学案体的代表作品。学案体例大致为：每学案前先设一表，详细地列举该